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比较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经济周期以及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对比两个时期4次宏观调控,得出以下经验: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宏观调控必须讲求方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心理预期;改革开放要警惕‘极左’和‘极右’两种倾向;在经济理论上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在总结过程中,注意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以历史为主线,概括当时的经济过程、中央政策、理论争论与社会心理,涉及关于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市场非均衡诸多理论,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 理性预期 舆论导向 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4-0021-06

在目前形势下总结30年宏观调控,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国正处于第五次经济周期上升期,经济增长率连续数年接近10%,经济过热,积累过高,信贷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投机资本大举进入,能源与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房地产泡沫经济过大,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性有深刻的背景,绝非只依靠中央经济政策就可以奏效。

中央控制经济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关键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发展下去势必加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大的起伏。这次宏观调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在理论方面的干扰,这是五次宏观调控最难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次,关系到处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其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

一、20世纪80与90年代我国4次经济周期

根据刘树成^[1]、宋国青^[2]等人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历了5次周期。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降低了1.6%,1976年突然上升为7.6%,1978年达11.7%,来势猛烈显然与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大变动有关,新领导发动了一次经济跃进,引起投资过热,比例失调,消费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国民收入超分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正

式出山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调整。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样一种搭配实际是最佳的。改革开放自身会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宏观经济的平衡。但是陈云思想长期被改革开放派认为是‘僵化保守’。直至1980年12月经济继续过热,邓小平批判‘洋跃进’,他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中央更换了领导人,进一步大调整,才见到成效,1981年经济增长率降为5.2%,波动幅度为6.5个百分点。这次周期共5年,上升2年下降3年。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1982、1983年经济增长率为9.1%和10.9%,1984年达15.2%。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1985年增长13.5%。因此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然而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因此1985~1986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1986年增长8.8%。这次周期共5年,上升3年下降2年,波动幅度为6.4个百分点。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经济继续

过热,经济增长率达 11.6%,1988 年为 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 1989 年出现政治动荡,宏观调控不能有效贯彻。直到 1989 年 11 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 3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使用大力度的调整措施,才见成效,难以避免的就是调整过度。1989 年经济增长率降至 4.1%,1990 年 3.8%。这次周期共 4 年,波动幅度 7.8 个百分点;上升 1 年下降 3 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 10 年以来,3 次调整的总结果,最终是在以强力政治整合,才得以有效进行。这种政治、人事、理论、经济、法律手段的综合使用,终于结束了 10 年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全面回潮,直接影响到党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

于是,第四个经济周期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再次掀起高潮。1991 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 9.2%,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1992 年初小平南方谈话,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帮助地方政府突破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控制。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追求高速度等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次出现。1992 年经济增长率达 14.2%,物价上升 5.4%,1993 年经济增长率 13.8%,物价上升 13%,投资消费双膨胀,煤电油运原材料供给紧张,金融秩序混乱,人民币黑市汇率贬值到 1:11,如果再不控制,3 个月内滑落到 1:15,已有预期。

199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 16 条措施,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紧缩在 1994 年下半年曾发生动摇,但最终得以坚持。1993~1996 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 1 个百分点,1996 年为 9.6%。

这次宏观调控是最成功的。首先是中央领导层态度一致,能够长期坚持。其次是策略灵活,采取渐进“软着陆”。人民币在 1994 年以并轨为名一次贬值 50%以上,促进了出口。存款利率提高到 11%,3 年保值补贴率达到 20%,国内通货膨胀受到有效控制,物价在 1996 年回落到 6.1%。1997~1998 年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幸免于难,得益于这次宏观调控,也得益于在危机爆发以后政府的坚决干预:人民币不贬值,不自由兑换,支持香港托市并准备改变交易规则,坚决控制投机资本。

1997~1999 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 8.8%、7.8%、7.1%,从 1993 年算起,连续下滑 7 年,前 4 年是主动

调整,后 3 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层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 1998 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包括刺激房地产业。2000 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 8%,2001 年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又下降到 7.3%。1997~2001 年“七上八下”相对平稳,相对于世界经济,仍旧是非常高的速度,称为“一枝独秀”。

1991~2001 年的经济周期长达 11 年,经济波动幅度 7.1 个百分点,上升 2 年下降 9 年。时间长,波动幅度小于 80 年代,说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坚决而且趋于成熟。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对比,宏观调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难忘的教训。

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效益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教训,这就是认识长期不能统一,理论不成熟。中央数次调整力度不够,不能遏制经济过热,10 年的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在政治强控制之下进行一次总的紧缩,使增长率迅速下降,而且下降过度。

经济发展避免不了周期,外汇不足和物价上升,总是迫使经济从高峰下滑。中国 80 年代的发展,外汇短缺比物价约束更硬,迫使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直到 1994 年以后外资大量进入,才逐步摆脱外汇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即增发货币促使总需求扩张,超过了流通的正常需要,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条件下就使物价上升;一种是成本推动,即垄断或改革的因素提高了成本,在需求旺盛的时候企业可以提高售价向市场释放,在需求紧缩的时候无法释放,就成为企业亏损。物价的上升,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是需求拉动,下降阶段是成本推动。

中国的物价上升,在 1979~1985 年期间主要是第二种,即价格改革的因素。改革的起点是农产品价格提高 20%,必然出现价格连锁上升,国家以财政补贴遏止城市消费品物价上升。但长期财政补贴造成财政赤字,最终转化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1985 年以后就是如此。国家价格改革的方针从“以调为主”变成“以放为主”,增加了市场机制,消费品价格在 1985 年上升 6%,1986 年上升 8.8%,1987 年上升 6%,1988 年为 7.3%,其性质主要是价格和汇率改革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

必须认识到,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在集中

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物价上升与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

对于逐步加速的通货膨胀,认识不能统一,1997年以后,在宏观经济不平衡时加速改革,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还准备强行‘价格闯关’,是一次大失误。在改革方法上缺乏经验,不适当的宣传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失了方寸,把社会矛盾泛政治化,加速社会动员,加剧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政治动乱。只是在最后关头,老一辈革命家统一了认识,从政治上进行了强控制,才把经济和社会来了一个彻底的整顿,这样的整顿,当然免不了殃及池鱼,紧缩过度,理论逆转,政策反复。这样的大起大落,损害是多方面而且非常深刻的。

1990~1992年中央在政治强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全面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放开价格”,取消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物价放开,基本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正所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严格控制总需求以后,价格改革引起的成本提高不能向市场释放,转化成物价上升,而是转化为企业亏损。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3000亿存款规模时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现在增加到十几万亿,没有再出过笼。关键在于宏观调控能否控制总需求。

只有在宏观平衡或适度紧缩时,才是最有利的改革时机,这个道理在90年代继续被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整整进行了5年,亚洲金融危机又造成了新的经济紧缩,但许多实质性改革如国企、住房、教育、医疗改革,却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三、成功进行宏观调控必须讲求方法,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心理预期

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点是尊重国情,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吃饭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保持财政物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这在许多人眼里是计划经济的保守思想,但每到外汇、粮食和原材料紧缺,交通能源紧张,物价上升,陈云的经济思想就显示其生命

力。邓小平执政是以批判华国锋‘洋跃进’为契机的,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政策,这实际是最好的搭配。

1985年第一次通货膨胀,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但理论界出现‘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朝野认识均不能统一。“中青年经济学家”步入历史舞台,有些人看不起老一代的经验,把陈云经济思想贬低为计划经济下的消极静态平衡,要摆脱陈云思想的束缚。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知识只是一知半解,所知道的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纪录。当时居民存款只有3000亿元,未必就发生抢购,抢购的真正原因是决策层以错误宣传引起通货膨胀预期。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人一下子买200kg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

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5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选择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进行难度最大的改革。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此时不适当的宣传起到了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988年5月19日,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总书记在5月24日会见外宾时就谈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很好,具备了价格改革的条件。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革话题”栏目发表的题为《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采访记,说“只强调价格改革如何困难、要冒风险,这恐怕不太全面”。“应该正面大讲特讲:价格改革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是个推进,而且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过分紧张心理。”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调整难度较小,成功把握较大。”8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进行价格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大张旗鼓宣传“长痛”不如“短痛”,甚至成立宣讲团,到处进行“改革的再教育”,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在经济学界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了长达4年的经济调整和“左派”理论回潮,全社会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同时,经济全面失控。

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物价上升5.4%,1993年经济增长率为13.8%,物价上升13%,1994年时任副总理朱基主导宏观调控。但遭到投机资本及其代言人猛烈的攻击,一批著名的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批评“复辟计划经济”,并提出“工资与物价挂钩论”“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说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过瘾。

左大培发表文章《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3],激烈批判某些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代言,因此受到他们的集体封锁。笔者当时支持了左大培,“经济学非主流”派因此而生,经济学界因此出现一次新的大分裂。

我们引入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比如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进行了彻底的反驳。中国经济学界食洋不化的一个例子,就是长期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必然损害经济增长。其实,发达国家的

“停滞膨胀”早已打破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型也出台了,钱纳里和许多国际经济学家都证明了,从数十年看,通货膨胀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学最新的概念是“自然增长率”,超过这个增长率,物价会加速上升,而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将比物价下降得更快——这就是说,在自然增长率之上,根本没有什么“物价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其内在原因可能有许多,理性预期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释。这就是说,当国家增加货币发行刺激经济的时候,会产生“货币幻觉”。企业家误以为价格上升是自己企业产品有销路,因此扩大了生产,其实,所有企业都因此扩大了生产,但企业家并不知道。通货膨胀在短时就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生产很快过剩。再维持高经济增长就需要继续制造更大的通货膨胀,数年以后必定难以为继。此时生产下降,但物价却降不下来。因为,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当企业普遍采取“限产保价”的时候,停滞膨胀就发生了。这样来驳斥“物价与经济同步增长论”,其效果非常彻底,彻底到一篇短文出来,此论就彻底销声匿迹。至于学习拉丁美洲把“工资与物价挂钩”,更加不值一驳,只要指出中国大多数农民不拿工资就够了。由于理论上的逐步成熟,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中央政府认识一致,政策坚决而且能够长期坚持,这次“软着陆”耗时5年,终于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免了经济的较大波动。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改革失误较多,而宏观调控较好。这与理论的引导和决策层的选择有直接关系。

1997~1998年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是又一次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果。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支持港府维持联系汇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香港政府力托股市,把100多年来的“积极不干预”变成了积极干预,甚至准备改变金融交易规则,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极其激烈的争论。

香港特区政府董建华指出:“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守不干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活动的政策。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即当炒卖港元与炒卖股票和期货相关联的时候,政府有责任采取果断措施减少市场混乱,恢复秩序。”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我也不想进行这么大的动作,但为了香港,我一定要做……我们也会扪心自问,香港是否有结构危险,但政府无乱开支,反而有500亿美元的财政储备,本港企业也无过度借债,港股的市盈率已跌到单位数字,地产价也调整了一半。我们不希望无限期地遭受炒家威胁,须以行动保护

自由市场稳定。”

“政府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但是,如果这个自由市场遭人操控,使得利率和市场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让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与美元脱钩,这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自由经济吗?”

香港联交所副主席认为:“市场人士基于干预市场自由运作理由批评港府入市,实欠缺公平。因为港股经炒家多次摧残后,本地区正常投资已无力抗衡炒家力量,造成大市一面倒,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普通大众。港府宣布高调入市可以挽回投资者信心,是有必要的,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

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由于亚洲风暴的影响,香港无可避免地要经历极为严峻的经济调整,社会正因此而承受极大痛楚,我们不需要那些炒家来操纵我们的货币,加深我们的痛楚,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从沽空期指中获利。这种手法也令股市以致其他资产市场调整过度,产生不稳定因素,危害本港稳健的金融体系。”

经济学家里只有少数人赞成,如美国克鲁格曼说:“极端形势需要极端措施,拯救亚洲要用重药,比如外汇管制,否则会出现经济大衰退。”

批评者如香港大学张五常,一直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把香港的经济前途拿来与炒家豪赌,只会输多赢少。跌市不是坏事,跌得急,将来涨得也快。而港府不断使用外汇储备托市,只会吸引炒家沽售港股,以赚取暴利。港府 700 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微不足道,倾囊而出也只是‘担沙填海’,毫无作用,港府不可能同时兼顾股市、汇市和楼市。而只能选择救汇市,稳定利率和汇率。

索罗斯的副手、基金经理德肯米勒说,港府是逆市而行,“无论他们想在市场做什么,下星期一早上醒来,他们的经济仍然是衰退。长远来看,我不认为联系汇率可以维持,经济衰退的国家……我看不出他们的股市有任何希望”。

摩根斯坦利银行:“政府干预市场可能令长线投资者远离港股,使香港股市成为政府与炒家角力的场所。”

巴林证券:“港府放弃不干预政策,增加了亚洲地区的不明朗因素,并打击长线投资者来港投资。”

《明报》社评:“港府直接干预证券市场的买卖,虽说是非常时期下阻遏货币受操纵的例外举措,可以理解,但始终不是一种受国际金融社会欢迎的行为,一再使用会严重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信报》社评:“自去年 7 月金融风暴开始时起计,政府先后干预地产市场,停止 9 个月卖地,香港的金融管理哲学已全面变质,金管局也越来越像一家中央银行。”政府此次托市的好处是短期稳定市况,打击了部分炒家,但对捍卫金融体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要边走边看。而其坏的影响则比较长期: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受损,香港的基本因素受损,金融市场交易技巧大变,选择性托市造成不公。”

《亚洲华尔街日报》指出:“港府已放弃传统货币发行局的被动机制。该机制是在固定汇率下让港元和美元自由兑换,遇上炒家沽空港元引致资金紧张时,则让资产和利率任由市场调节。港府干预已直接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认为:“港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最终将伤害香港,而且一开始干预则不得不继续干预,全球这么多对冲基金,根本无从应付。港府不可药石乱投。如让真正的货币局制度运作,利率只会轻微上升,不会大幅上升。保护港币更合理的做法是发行联汇保险票据,以保持市民对联汇的信心。”

美国四大证券行要挟要离开香港。美林、大摩、雷曼兄弟和高盛在 1998 年 10 月份纷纷指出:港府干预市场,违反自由经济原则,不但运用外汇基金入市吸纳股票,而且成为全球首个国家地区之期指炒卖活动的参与者,建议客户撤出。

我国政府坚决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舆论和理论的压力,坚持抵御压制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实际上就是从那次以后才真正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目前的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个经济周期始于 2002 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 9.1%,2003 年 9.1%,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2004 年 9.5%,实际上恐怕已超过,因为能源消耗惊人。1995 年初国家修改 GDP 统计口径,加入第三产业漏计部分,一次性把 GDP 提高 20%,原为 136 000 万亿人民币,修正为 159 879 万亿人民币。基数大幅度提高,增长率就应该下降,但 2005 年仍旧高达 9.9%,2006 年也不会降低。

我国经济已严重过热。一是积累过高,已超过 45%,2006 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9.8%,与过去两年同期相比增幅最高;二是信贷投放过多,2006 年上半年,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2.15 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同期新增贷款的 1.5 倍,达全年预期目标的 86%;三是对外贸易顺差过大,连续两

年超过 1000 亿美元 ;四是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促使国家外汇储备猛增,2006 年将超过 10000 亿美元 ;五是能源与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六是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目前已形成稳定的继续涨价预期,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它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直接表现为政策失灵。当所有人预期高度一致时,就没有人会相信政策调控的效果。“国八条”2005 年 5 月出台,随后 3 个月房地产交易量大幅萎缩,房价回落,年底才出现反弹。2006 年 6 月“国六条”出台,7 月份全国 70 个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北京 7 月份环比增长速度为 1.4%,超过 6 月份,中国面临着泡沫经济膨胀以后再崩溃的风险。

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势必会加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大的起伏。中央政府 3 年以来一直控制经济过热,2006 年又提出要重点抓好 7 个方面工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积极扩大内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切实抓好自主创新,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提法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 20 世纪 80 年代类似。不同的是,80 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还在,问题主要出在认识上,只要认识一致,就有能力迅速收拾局面。随着老一辈离开政治舞台,社会利益集团扩张,中央在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肯定要削弱,向新权威类型转化太慢,转化期间出现权威真空或者不足难以避免。90 年代宏观调控的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层认识一致,弥补了权威的不足。目前的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迅速扩张,这就是地方政府,国内外投机资本,与某些经济学家联盟控制经济学话语权,力图打破中央宏观调控,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制造经济泡沫,谋求集团利益,各权力部门则通过垄断谋求高额利润。

中央领导虽然深得民心,但比起强大的既得利

益集团迅速扩张,社会利益机制严重失衡,中央权威相对削弱。如宏观调控迟迟不能见效,中央权威会进一步削弱,甚至出现比 80 年代更加严重的危机。

至于认识,表面上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是比较统一的,但深层次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现在是 30 年以来认识最不统一的时候,社会学家孙立平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如果说精英层已经成功地排斥了不同意见,达成了一致,那么中国就面临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分裂,关于改革的共识,如果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无论如何难以达成^[4]。既得利益集团猖獗,主张以权力资本瓜分国民财产的极右思潮甚嚣尘上,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中央的决策。他们的理论代表可以动员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争论的关键时刻出来表态,帮助他们说话。他们的利益代表可以直接干预和改变经济政策,如房地产领域,未来还有金融领域。如果放任利益集团无限扩张,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把中国拖向经济与社会危机。

在目前形势下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这次宏观调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在理论方面的干扰,这是五次宏观调控最难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次,关系到处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其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 宋国青.走出经济周期[J].证券市场周刊,2005-02-28.
- [3] 左大培.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N].经济学消息报,1994-03.
- [4] 孙立平.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N].21 世纪经济报道,2006-03-20(004).

· 简讯 ·

河海大学 3 项成果获 2006 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励

2006 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河海大学有 3 项成果获奖,其中沈菊琴教授主持的项目‘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移民监理论与实践探索’获二等奖,阮晓红教授参加的项目‘生物生态技术治理污染水体的关键技术与示范’获二等奖,刘德有教授参加的项目‘水工金属结构安全评估的技术标准研究’获二等奖。

(本刊编辑部供稿)